

第二節 教育問題與教育目的的關係 83-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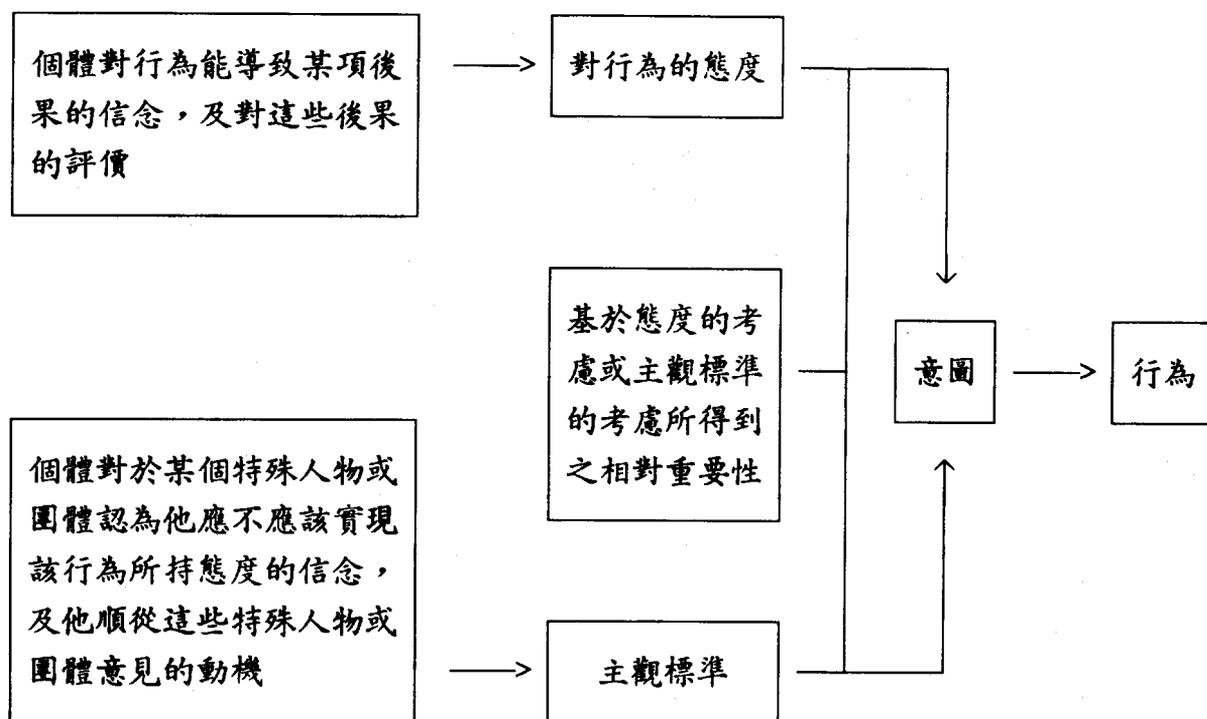
本研究在基礎國民教育目的的探討中，顯現出大多數的教師、家長及學生認為教育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使一個人成為「社會有用的人」，亦即「學習做人處世的道理」及「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而「能夠找到好工作」及「提高個人的社會地位」並不為多數人所接受之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同樣的，「教導學生（或子女）做人處世的道理」是老師及家長認為最重要的教育責任，而「考上好的學校」則不是多數人認同最重要的教育責任。但是，在探討國中及國小的教育問題時，多數的老師、家長及學生認為最多的是「忽略了日常生活教育」，其次是「學生課後的課業補習過多」，或是「考試次數太多」，這似乎說明老師、家長及學生所認定的教育責任及教育目的，在實際的教育過程中無法實踐，甚至受升學主義的蒙蔽，而產生認知與行動間的不一致現象。

實際上，過去有關態度與行為之間一致性的研究，呈現不一致的結果；Wickers (1969) 認為態度與外顯行為之間是無關的，而 Schuman 和 Johnson (1976) 則認為態度和行為間有一致性的關係。Sears, Freedman 和 Peplau (1981) 則認為影響此種不一致結果的因素計有：(1) 態度的強度，亦即當態度愈強烈時，則態度與行為的一致性就增加；反之，當態度軟弱或模稜兩可時，態度與行為的一致性就降低；(2) 態度的穩定性：當態度與行為的測量相隔時間愈長時，態度與行為的一致性就愈低；(3) 態度與行為的關係：態度與行為間的關係愈特殊，它們的相關也愈高；(4) 態度的突顯：當一項有特殊關聯的態度變得特別明顯時，它與行為之相關將更高；(5) 情境壓力：當人們擬將付諸實行時，態度和當時的情境這二者均能對之產生影響，而如果情境的壓力相當大，此時由態度而來的壓力相對變得微弱，就無法產生如預期般的影響力。

但是這些因素在說明態度決定行為的看法過於簡略，因為它們無法回答這些因素什麼時後會有影響；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人們的行為有多理性？是否可以從他們的態度很邏輯地推論出他們的行為？

Azjen & Fisbein (1980) 提出「理性行動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來說明上述的問題，其模式可如圖六-1所示。由圖六-1可知：(1) 一個人的行為可從他的意圖(intention)來預測；(2) 行為的意圖又來自兩個變項的影響：個體對行為的態度及對於他人(重要他人)所持態度的知覺；(3) 態度是行為結果的函數，因此個體會考慮每個結果是好是壞，及好壞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個人會因重要他人偏好的信念及順從他人的動機，而形成個體的「主觀標準」(subject norm)，影響其「預期—價值」，並進一步地影響態度與行為間的關係。

所以由Azjen & Fisbein 的觀點，個人的「主觀標準」對態度與行為間的一致性及行為的意圖有極深的影響，而個人的主觀標準又深受重要他人的信念及是否順從他人信念的影響。由此觀點來看「培養做人處世的道理」的教育目的及責任與最重要的教育問題——「忽略了日常的生活教育」之間的不一致現象，我們就必須探討誰是教育過程中的「重要他人」，而他們的信念是為何？



圖六-1：理性行動論 (Azjen & Fishbein, 1980)

林清江（民70）從社會學的角度認為我國中、國小教育的問題在於：（1）升學主義的問題，（2）未來導向的問題，（3）教師專業權威的問題，（4）學校組織結構失調及（5）義務教育的問題。這五項問題中，前三項的問題關係到學生的社會化教育目標，例如：教育的未來導向目的是協助文化的創新，使下一代在知識、品德、價值及行為方面，能夠適應未來的變遷，更能夠促進未來社會的進步。一旦教育未能達成上述目的，社會易趨於保守，文化進步減緩，個人因應變遷的能力減弱。林清江指出，中、小學教育在未來導向方面則較忽略，而偏重於傳統文化的傳遞與發揚之傳統導向。造成此種忽略的因素有三：一是教師的知識及態度，二是教材及教法的更新，三是學校的計劃（林清江，民70）。由此可知，在教育過程中，教師是最重要的關鍵人物。教師若具有充分的現代知識，並建立觀察及關懷未來的態度，才能加強教育過程的未來導向。

事實上，本研究發現大多數的老師、家長及學生認為好的國民中、小學應具備的條件中，最重要的是「老師要很有愛心及耐心」，亦支持上述之觀點，但是否未來導向的教育過程就完全落在老師的身上呢？由本研究的調查結果發現，老師認為好的國民中、小學所應具備的條件中，除了「老師要很有愛心及耐心」之外，「校長觀念正確」及「每班人數不能太多（30人之內）」亦屬重要，此兩種因素似忽隱含著一旦領導者的觀念不正確，或是班級人數太多，要老師很有愛心及耐心是較困難的，因此老師的「力不從心」之感就油然而生。所以老師與行政主管單位的相互配合是重要的。林清江（民70）認為需值得注意的是，當學校組織越趨於複雜時，有部分老師對其本身的工作就會感到沒有多大的影響力；對自己所遭遇的問題，沒有解決的能力；對於工作的理想欠缺信心。前述以 Azjen & Fishbein 的合理行動論探討態度與為的一致性時，論及一個人的態度與行為間的關係會受到個人主觀標準的影響，而此種主觀標準又受重要他人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出學生對「社會化」教育目的的貫徹，會受到老師對此態度的影響。相對的，老師的態度又將受領導者觀念的影響，一旦領導者的觀念不正確，則將影響整個社會化教育的過程。例如：一旦有林清江（民70）擔心的老師與學校組織配合所衍生的問題，那我們也不得不注意領導者（如校長）對「社會化」教育目的的觀念是否正確，因為這將影響學生的學習。

輔導網絡建力的過程中，在新築地區與嘉義地區的地方會議裏，常可看見以下的情況：學校習慣性地將輔導工作等同於個案處理，且往往當孩子稍微有問題時，就被當做個案處理，結果孩子被貼上「標籤」，問題不見得獲解，卻已造成反效果。此種情形說明輔導網絡（一）的建立及概念，猶待大家的努力。本研究認為輔導網絡（一）的建立，是需要學校及教育行政單位對輔導的概念及「社會化」教育目標的確定有所共識，如此才能有效地以組織來達成社區資源與學校的合作，完成學生的社會化或生活化教育。

林清江（民70）與楊國樞及葉啟政（民73）都提及升學主義對正常教育的影響。楊與葉二人認為造成升學主義的盛行有下列因素：（1）傳統觀念的作祟——「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仍在作用，使得知識乃在於瞭解人生的意義與情感及思想的基礎之目的，轉換為尋求社會地位與肯定的個人價值的最有利、最有效之手段；（2）人才訓練的作育機構與人才的使用機構的分開及獨立，不得不以文憑及考試資格來選擇人才，這加劇了「升學」的迫切需要。

在本研究的調查中發現，大多數的人並不認同教育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在「提高個人的社會地位」、「考上好的學校」或「找到好的工作」，但是何以仍有一成至兩成的家長及學生認為「學生花太多課餘時間接受課業輔導」？此種現象說明，雖然大家在認知上能有良好的教育態度，但是「升學主義」的影響畢竟是大的。就如前述論及造成態度與行為不一致的因素中，或許我們可推論「培養適應社會的能力」、「養成做人處世的道理」等態度不及「考上好的學校」的態度對未來的發展來得強烈、特殊性或是有壓力，因此使得平時的教育行為便走向「升學主義」。

不過，楊國樞與葉啟政認為解決升學主義的負向影響之途徑中，提及突破各級職業學校就業及升學的瓶頸是可嘗試的。林清江（民70）更強調義務教育不再僅是討論從九年延長至十二年的功效，應該要加強職業學校為主的國民教育。林清江認為升學主義的主要成因，在社會而非在學校。因此學校可積極進行的工作，以祛除升學主義的不良影響的方法之一，便是協助學生體驗就業生活，改變部分不當之升學意願。

本研究的結果發現，一成以上的家長及學生任為教育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學習應用的知識與技能」，但是較少數的老師如此認同。由此可見，老師傳授知識的目的與學生、家長的期待是有差異的。不過，老師在教育的過程裏，是會直接影響學生的價值，所以老師如何在授課的過程中，除了讓學生瞭解知識之外，對於知識的靈活運用與相對技能的培育，可能是讓學生明瞭探求知識與習得技能的差異，並藉此讓學生分辨其是否自願就學或就業，而養成「就學或就業不過是一種人生的選擇，無關乎高低或好壞」的態度。

楊國樞與葉啟政（民73）、林清江（民70）等學者強調輔導工作的落實，是祛除升學主義影響的解決途徑之一，亦即如能落實生活輔導、教育輔導及職業輔導等工作，將可幫助學生的身心健康，瞭解自己，並對自己的生涯有良好的方向規劃。而這些輔導工作是否全部皆由輔導老師來處理呢？在目前中小學校的輔導老師編制的限制，這些工作又該如何進行呢？以下的章節將討論之。